



我的

9787118

葛剑雄/江 畅/卢新华/邵 鸿
汪毅夫/温元凯/周振鹤/朱学勤/等著

东方出版中心

我的
97178

葛剑雄/江 畅/卢新华/邵 鸿
汪毅夫/温元凯/周振鹤/朱学勤/等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七七、七八 / 东方出版中心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8. 1

ISBN 978-7-80186-801-5

I. 我… II. 东…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654 号

我的七七、七八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15.75

插 页: 3

印 数: 0,001—7,1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801-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近几年,随着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读《论语》心得,我们那位一度“累累如丧家之犬”已被冷落多时的孔老夫子又重新风光起来了。这应该说是件好事。因为我们这位“大成至圣先师”是完全有理由受到广大群众尊重的,他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思想财富。不说别的,仅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足够我们咀嚼多时了。

是的,“逝者如斯夫。”三十年前在中国大地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是已被历史的长河带去多时吗?当然,它带去的是一回事,沉淀下的又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因为当时那些事情(诸如恢复高考、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对我们国家、人民以及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虽然时过境迁,但仍然有许多细节沉淀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心里,久久不能忘怀。只要一旦搅动,它就会重新浮上心头……

本书的编撰与出版,即是通过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有关事件的回忆与思考,以让更多的青少年读者(包括自己的孩子)能了解这一段历史,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书的编撰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与鼓励,他们都认为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很有意义,如有位作者来信认为,出版这类图书“可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点值得记忆\值得总结\值得思考的东西,我们都已近花甲,走向暮年,该回头看看了,也该给后人留点精神遗产了……”正是在大家通力合作下,本书在2007年末2008

年初得以出版,这也可以说是对1977、1978年三十周年的一个特别纪念吧。

说起来可能是巧合,本书恰巧也收录了三十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湖北、福建、江西、安徽、吉林等全国各地,虽然他们毕业于不同的院校、专业,而且现在的身份、职业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学者名流,还是政府官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七七、七八级。”

也许因为这样,所以在这些文章中,回忆与谈论恢复高考的相对多一点。大家普遍认为,高考的恢复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春天第一声”,如温元凯在文章中说:“作为恢复高考的倡议者、受益者以及见证者,我觉得非常自豪。可以说,1977年的‘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就从一个单纯的书生,变成一个热心关心国事、关心民族的命运和我们一代人命运的思想启蒙者。而恢复高考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这种选择带来的改变,使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其历史影响和价值是无法估量的”。程德林也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570万考生及其所有家人的希望,也恢复了亿万中国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心。那年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部分人的命运,更是直接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以这种具有震撼力的改变影响了整个世界。”

但历史毕竟已经走了三十年,高考制度现在也显露了一些缺陷或不足。在这方面,从当年的考生到现在主考官的江畅深有体会。他说:“我的工作实践以十分有力的事实一而再地告诉我,实行了三十年的现行高考制度虽然经过了一些小改小革并取得了不少进步,但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根本性局限和问题,与国外同类考试相比,需要作较大的甚至根本性的改革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学者周振鹤也就高考录取政策存在某些不公平谈了自己的看法。由此看来,随着阅历的增长,大家对给自己与家庭命运带来转折的高考也有了理性的思考与判断。

除了上面的一类文章外,书中还收录了三十年前影响甚大的“伤痕文学”与

“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卢新华、竹林的有关文章,对当年小说《伤痕》、《生活的路》的问世背景、因缘等做了回忆与思考。如卢新华认为:“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习作,一篇普普通通的墙报稿,经由《文汇报》的发表,《伤痕》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而热烈的反响……就这一点而言,它确实是幸运的。”而这幸运就来自当年开始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竹林也同样认为自己创作的“为当时受尽苦难、遭尽不幸的一代知青发出了第一声呐喊”的《生活的路》,“沐浴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第一缕春风。”

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历史已经走过了三十个春秋。许多在现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年都发生过了,并在这一代人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痕。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时至今日,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教育发展,人民生活水准日益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已位居世界前列,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切都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珍惜的。回忆过去,是为了清醒地看待现在,更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如果本书能在这方面起到一定作用,那我们作为本书的编者就会感到莫大的欣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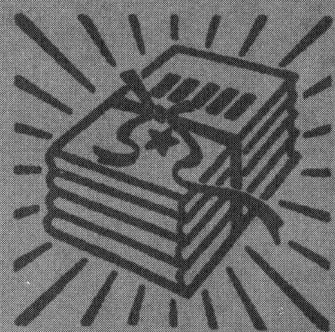
编者

2007年初冬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告别北大荒 / 陈可雄 2
我的 1977 / 程德林 10
如果没有 1977…… / 戴冠青 20
能上学读书,我很满足 / 邓鸿光 26
天凉好个秋 / 方 明 32
1978,我的人生转折 / 葛剑雄 40
出篱笆 / 葛 健 48
改变人生命运的一场考试 / 广 浩 54
向左转,我的 1977 / 韩伟冬 58
糊里糊涂学了历史,不亏 / 何晓明 68
从参考到主考 / 江 畅 74
喊醒睡着的梦 / 金尔文 84
我要上学(四记) / 李飞龙 92
1977 年高考日记 / 李恂生 112
我的梦 / 刘占武 124
《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因缘 / 卢新华
132
我的七七级 / 邵 鸿 138
三十年前那一刻 / 施晓宇 146
三十年前的考场 / 唐 颐 152

- 1977年的大学梦 / 汪毅夫 156
- 艰辛的求学之路 / 魏达志 160
- 梦有多远,人生路就有多长 / 温元凯 170
- 乍暖还寒话报考 / 伍伟民 180
- 关于七七、七八年的回忆 / 许锦根 190
- 难忘的时刻 / 赵 明 198
- 录取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忆恢复高考三十年
/ 周振鹤 208
- 呼唤那顶红色油纸伞——我从知青到走上创作道路的回顾
/ 竹 林 218
- 我的母校情缘 / 朱孝远 230
- 一年高考一年题 / 朱学勤 236
- 考上大学就不一样 / 朱以撒 240



《革命年代》书影

《革命年代》是作者的一部小说，也是作者的一部自传。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的描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革命年代的风貌，也描写了革命年代的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革命年代的风貌，也描写了革命年代的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革命年代的风貌，也描写了革命年代的人。

陈可雄



我和我家的小狗比利、点点

陈可雄, 1950年10月出生在上海。1968年秋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 做过农工、基建工、团报道员和师宣传干事。1978年2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习, 四年后毕业到北京当记者, 现为《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主任。

告别北大荒

1978年年初的一天，我在宝泉岭的丁字路口，默默站了很久。风雪迷漫，积雪没膝，眼前都是熟悉的景象：师部办公大楼一个个紧闭的窗口，后山密密伫立的红松林，还有烟囱管像手臂一样伸出来的红砖瓦宿舍……难舍难离的情绪又涌上心来。口袋里捏的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有点发烫，多日的欣喜一下子全消失了。

我真的要走了吗？眼睛潮湿了。雪籽飞扑进眼里，又化了，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雪水。眼前一片模糊，心里一阵阵疼：屯垦戍边，不是说好“扎根边疆”吗？风雪十年北大荒，不是说永远不离不弃吗？

司机小林轻声地摁着喇叭，催促我不要误了从鹤岗开出的火车。

或许，我的离开，仅仅与一个人有关，——我曾经朝夕相处的首长尹先民去世了。

“尹首”，我喜欢这样称呼他。他的长相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东，瘦高个，喜欢披一件黑呢大衣，脸清癯，一双鹰隼般的眼睛盯着你时炯炯发亮，深邃、清澈。他是“三八”式老革命，原黑龙江省委财务处长，号称省委书记张林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文革”开始，张林池被打倒了，他下放到我所在的铁力独立二团，担任有职无权的副团长。我第一次接触他，是1970年冬天，随他去十一连蹲点。那时，我在基层连队当了两年的农工、基建工，刚被选拔到团报道组，对机关里的人和生活的陌生、新鲜。

十一连在远离团部一百多里的欧根河畔，驱车进去要穿过一个有九十九道弯的大林子，几乎与外界隔绝。连队安排我们住连部一间小屋，屋子里一铺炕，一火炉和一张办公桌。我和尹首就此开始两人世界的生活，很快稔熟起来。



初到北大荒

“小陈，今天我们去哪里呀？”每天起床，尹首总睁大眼睛，笑盈盈地问我。于是，我们下田地，去羊舍，或找人谈话。每有大会动员之类的讲话，我都会从最新的《红旗》杂志抄一段，穿靴戴帽地联系当时要讲的事，给他写好稿子。尹首在大会上会很认真地读完，然后抬头望我一眼，好像还带一丝讶问：“行了吗？”

夜幕降临，是最快乐的时光。守着火炉，尹首点上一支“群英”牌香烟，打开话匣子，与我谈天说地。他对眼前的军垦生产、战天斗地不感兴趣（“‘小镰刀打败机械化’，打败得了吗？”），对我们栖身的农场和连队人事纷争也几乎不闻不问，似乎只对发生在全国尤其是世界上的新闻和大事很关注；谈论间，还不时会问我一句：“我的高级知识分子，你的看法呢？”

我最喜欢听他讲自己的经历。抗战时他在安徽，一次鬼子扫荡，被围困在湖泊里一个多月，每天捞鱼吃、没有盐，吃得他至今看见吃鱼就恶心。特别是1949年解放进京，他是中央警卫团的营长，有许多保卫毛主席的故事：如主席出外散步，不喜欢看到有警卫，他们就不近不远地躲在树背后跟随，不能被发现；有一次，主席走到溪边，看到一老妪在洗衣服，就坐下来跟她聊天，半天不走，急得他们叫来秘书，谎称有要事报告，才劝回来。还有一次，毛主席住西山，上午附近机场的

军用飞机按常规起飞训练，机声隆隆响，习惯彻夜不睡的主席从屋里跑出来，大吼一声：“还让不让人睡觉啦？”气呼呼站在院子里不动了。谁也不敢上前劝，最后请来了朱德，才把他拉回去。从此那里的飞机上午再也不起飞了……当时正处于造神运动“毛主席——红太阳”的高潮期，听尹首讲这些，令我神往。有一夜，不知怎么提起“梅花党”，已经躺下的他从炕上翻起身来，“我来给你讲。我在大连公安局看过这个档案……”

尹首的思想也常常让我感到新鲜。有一次他念完动员报告，下来对我说，以前的战前动员不是这样的。首长在前面一站：“同志们，你们的脑袋长在哪里？”大家回答：“脖子上！”“不对！是别在裤腰带上的，一碰就掉了。但干革命就不怕掉脑袋，给我冲啊！”还有一次他问我：“打仗时，知识分子和农民谁勇敢？”我说：“农民吧。”“不是，知识分子！农民比较实际，总想着打完仗回家去种地；知识分子平时总被嘲笑怕死，打仗时，他们就冲在前面——‘老子今天死给你们看！’”

我崇敬他，自然在生活上对他照料十分用心。他有很讲究的一面，从连队食堂打来的饭菜，他一筷都不动，我就把馒头切成片，在火炉上烤焦、蘸白糖，他吃得津津有味。每次外出回屋，我都要取出一双黑色松紧布鞋，逼他换上；每次吃完饭，还要他洗一把热水脸。“怎么这么麻烦？”他一边像数落我，一边笑盈盈地接受了。后来说：“嗯，吃完饭洗一把热水脸，还是挺舒服的嘛。”

在十一连蹲点一个多月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但尹首和我结下的感情没有结束。回团部后，他不时会走进我团报道组的小土屋坐坐，和我聊天，像在蹲点的连部小屋一样。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张林池复出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有一天尹首走进来，说他要调离了，新任命大兴安岭林区党委书记，“小陈，你跟我走吧。”他目光带着期盼，盯着我说。

我摇了摇头，那时我还迷恋军垦事业，舍不得离开从城里一起来下乡的知青战友。

1973年秋，我被选调到宝泉岭二师师部宣传处当干事。师机关从师长政委到参谋、干事，大多是现役军人，我也开始单调又有序的军营生活。在通往后山小招待所的道旁，我有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单人床，床头堆放许多书。第二年冬



下连队办报道学习班(后排正中为作者)

天,有人敲门进来,披一件黑呢大衣,鹰隼般的大眼,笑盈盈地看着我。“尹首!”我欣喜地大叫起来。

原来那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要改制了,从军垦改回农垦去,二师变成了宝泉岭国营农场管理局。现役军人或撤回部队,或就地转业,尹首被派来接管,任党委书记兼局长,一把手。

我又和他在一起了,几乎形影不离。尹首的家放在佳木斯,没搬来。他依旧讲究,老脾气,不到大食堂吃饭,每餐到后山的小招待所吃。晚饭后散步回来,他就会拐进道旁我的宿舍小屋。

“小陈,我们去哪里呀?”尹首经常这么说着,走进我在四楼的宣传处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处长等我的顶头上司们,都站立起来迎候他,但他不理睬,会掉转身子直冲着我说话。宝泉岭局辖从中苏边境的绥滨八团到鹤立的十七团,再加上梧桐河等六个农场,方圆八百多公里,他还是不喜欢当时机关的氛围,只要不开会,就带我乘坐小林开的212吉普下团,一一去巡查。

那两年里,有许多时间是在吉普车里和尹首一起度过的。车程有时很长,开五六个小时,他总兴致勃勃地跟我谈天说地;谈论的仍不是眼前农场局的事情,还

是国家的、世界的大事。他原是张爱萍的部下,对邓小平的复出、抓治理整顿很赞赏,后又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困惑、压抑;而我那时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欣赏张春桥写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文笔多好!),我俩就不时争执起来。争来争去也没结果,我们地处偏远,谁说得清北京发生的事情呢?有一次,不争论了,他突然问我一句:“你觉得杨春霞漂亮吗?”我心一动,因为那时很少碰这样的话题,不知怎么回答。“我觉得还是很漂亮。”他自言自语说。

一到地方、下车,尹首还是尹首,我还是我。他讲话作报告,照样宣读我抄《红旗》杂志穿靴戴帽写的稿子,无论斗私批修,我写得有多狠,他都照念不误;同时,我也照样要他换松紧布鞋,洗热水脸。

只有一次,我想离开他。大概在1975年底,那时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局里分来许多名额,北大呀、清华呀,我看得心里痒痒的:只要尹首一句话,就会把我报送进名校的大学课堂。我去找他说了,他一下愣了,睁大眼睛盯着我半天说:“小陈,你去当个处长吧。”我急忙摆手,说:“谁向你要官做啦?算了、算了,不走了,我就跟着你吧!”他满意了,又盈盈笑了。

真正的感情是超出意识形态的。1976年四月“天安门事件”后,有一天深夜他突然跑到我的宿舍来,神情紧张地说:“小陈,你有什么传单之类的东西吗?快收拾一下!”原来那夜合江地区公安局长带队,来宝泉岭突击搜查所谓的“总理遗言”,尹首说他与此人不熟,生怕我遇到不测。他就是这样保护我。大约当年十月十日,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外电报道:北京市民兴高采烈,抢买三公一母螃蟹吃……李先念会见外宾谈笑风生……”一大早,我奔上办公大楼,敲开他的门:“快看、快看,北京好像有事了!”“看什么?舆论还不都掌握在你们张春桥、姚文元手里?……”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赶紧摸老花镜、接过报纸看。他看得很仔细,眉目渐渐舒开了,我也跟着他一起高兴。

此后,我看他的情绪越来越好,万没想到有乐极生悲的事情发生。北大荒好喝白酒,65度以上,尹首战争时期患过肺结核,医嘱不能多饮酒。以往我陪他外出,宴会很多,凡遇来敬白酒的,我都替他挡驾或代喝了。年底我返沪探亲,回来后说他病倒了,大吃一惊:原来春节他到驻地部队拥军慰问,白酒喝多了,大醉一场,结果造成肝癌发作——这使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痛悔自己那时没有陪伴在

他身边。

此后几个月,是痛苦的治疗过程。他给张爱萍写信,被接到北京部队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回师部医院,甚至用了许多土方,如让老母鸡趴在肚子上,都无济于事。最后病重时,他让小林专门接我去医院,“小陈,今后我们再不能一起去哪里了……”他眼睛盯着我、无力地说,目光仍是那么清澈、深邃,叫我心碎。

尹首去世时,我在二百多里外的军川农场整党工作组。听说那天下午要举行追悼会,清晨我搭上一辆大卡车,立即赶到师部医院。他蒙着白被单,孤零零地躺在大厅里,脚跟还点着一盏青灯,周围有工作人员砰砰唧唧地钉黑围幛。我上前轻轻揭开被单,“你干什么?”旁边有人要来拦我,我理都不理。他的脸色有些发青,神情安详,好像还是那么超然,只是那双鹰隼般的眼睛紧紧闭上了。“尹首,你的小陈来看你了!你能醒醒吗?我说好跟着你了,你怎么就走了呢?……”我泣不成声,深深朝他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又匆匆返回了农场。

那年年底,恢复高考,从上海探亲返回铁力的姐姐捎来一句话:“爸妈叫你考大学。”这时离考试只有七天了,如果尹首在,我是不会考虑的。仗着1967年学校武斗时,我每天到上海图书馆,用半年时间自学完了从初三到高三的全部课文,报



大学时代(左三为作者)

名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在黑龙江省只招一名学生，我考了 320 分，省里超过我的据说有三四十名。后来当了我班级指导员的于东远老师当时去招生，他招了我，说我正好够复旦分数线，语文单科成绩 92.5 分，全省第一名。还记得那年的作文题目——《每当我唱起东方红……》

大学毕业后，我曾六次重返北大荒，去踏访哺育我十年青春的黑土地和乡亲，思念之情永远放不下。但无论在宝泉岭，还是在佳木斯，我都没找到尹首的墓地。有一年返回时，在农垦总局大楼前坐上离开的大客车，突然看见二楼尹首的大女儿尹绍宇穿着白大褂，站在窗户前。我急忙向她招手，她也向我招手，我又招手，她也又招手；大客车将开未开、在那里停了二十多分钟，我和她就这样一直隔窗相望，不停地互相招手……我已泪流满面。

那年在途中，我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怀念》：

离别尹首久，重返宝泉岭。
千里来寻故地，飞雪盖风尘。
昔日炉边夜话，纵论水起云涌，
雄辩挟雷霆。
当时明月在，曾照斗志丰。

草依旧，燕相识，何去人？
拍剑空抚陈迹，谁与话殷勤？
难忘吉普驰骋，追忆细语叮咛，
柔情汨汨生。
独立送鸿雁，此心可寄凭？

尹首，我以此为您奉上一瓣心香！

2007 年 11 月 4 日 于北京